

黄伟宗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文艺论辨

Discrimination i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Period

当今国内外都兴起“文化热”。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重要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深入的研究和评论，固然要对与一定时代文学相联系的中外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研究，而对当今外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作出研究，也是不可忽视和更为新鲜的一个方面。因为外国学者的研究和评论，实际上就是外国文化的一种体现，外国学者们都是直接或间接以一定的文化观念去评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除了在他所在国发生影响，起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之外，也会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上看，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思想文化上的专著之外，影响最大的是外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批评。在文艺理论批评中，主要是一些体系性的理论，对中国文学的评论则很少。这是过去中国文学在外国影响不大、不受重视的缘故。随着中国文学在外国影响日益增大，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评论的日益发展，这种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也必然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起到反馈的作用，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同时也体现了

新时期文艺论辨

黄伟宗 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9.4万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306-00124-8

I·8 定价：4.70元

说“辨”及言文艺批评观

(自序)

到现在为止，我算是写出了几部书。实在地说，在这些书中，我写的时间最长、用的功夫最多、自己也比较满意的，是这部《新时期文艺论辨》。这是从1977年到最近的论文选集，是从这10年时间发表的约80万字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以小说评论文章居多。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我写其他书用的时间和功夫不多。其实，这部论文集子与我的其他论著的写作，是密切关联、互为因果的。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原则：既要从不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文艺实际出发，经常写些有助于现实和文艺发展的评论文章，又要进行定向的系统的理论问题研究；理论的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在进行经常性的文艺评论中并行探讨现实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或对新的文艺现象进行概括。这就是说，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性的评论与系统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我写的《艺术辩证法》，是鉴于极“左”文艺理论长期否定文艺规律而进行的系统理论研究；同时以研究的成果去分析新的创作实际，又反过来推动对理论的系统探讨。《创作方法史》和《创作方法论》两部专著，是我在对新时期文艺实践的分析研究中写出来的，并以研究所得去分析评论了好些新的创作；《欧阳山创作论》和《欧阳山评传》两部专著的写作，既是对有影响的作家的专题研究，又是对艺术辩证法、创作方法等理论的具体

运用。

前些时候，好些青年评论家纷纷发表了谈自己文学批评观的文章。我很羡慕他们生得逢时，出生在一个可以提倡个人批评观的年代。我已年过半百，不沾“青”边又靠不上“老”，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虽然搞文艺理论批评算是近30年，顶多算“半个评论家”。因为我的水平低，而且从来都是搞业余创作，过去在当编辑之余写点应景文字，近10年是为教学和研究需要而写点东西。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极其羡慕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因为他们不到“而立”之年就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批评观和理论体系，而自己在那种年纪时对此是不敢也不能想的，只能随“风”而动，按“框”填文。我并不认为当一个人尚未成熟之时就自称有文学观是好事，因为思想是随经历和学识的增长而发展的。但我赞成文艺批评应有自主意识，这才有独特的发现。但这又不是纯主观的，必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文艺批评毕竟是科学，不是随心所欲的文艺欣赏。聊为可慰的是我在“不惑”之年后终于认识到这个道理。这是从自己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正好赶上当今这个可以有个人批评观的年代。这部论文集正留下了我探求的足迹。如果有人问我的批评观如何，我的回答就是这论文集的题目所示的“辨”字。新时期以来我始终是在做这个字的文章。大致上说，我是从下列几个方面做“辨”的文章的：

一是对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探究。一方面是分辨极“左”思想和理论与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以肃清“左”的余毒，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是从新的文艺问题和新的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以促进文艺思想和理论的活跃和发展。总的来说，开始阶段偏重做前一方面的工作，近年精力多用在后一方面。本书第二部分中关于人物形象和关于悲剧等问题的几篇文章，是前一阶段实践的产物；关于创作方法、关于外国学者的

评论、关于新闻与文学交叉点等的问题的探讨，则是后一阶段探求的迹印。

二是对于文艺总体走向的把握。我主要是通过小说的发展进行这种把握，因为我觉得小说在我国文艺的发展中起着牵头和主干的作用，所以我写小说评论居多。本论文集也以小说评论为主体。《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一文，是我下“辨”的功夫最多的。“辨”的出发点有二：一是新时期小说与过去（主要是解放以后）小说创作的比较；二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实践的新特点进行理论概括，看它对原来的小说理论和文艺理论有哪些新的突破；着重从艺术上去“辨”，也可以说是试图改变历来文艺批评模式的一种努力。

三是对作家或作品的评论。这些文章大都是短小的，表面上看用的功夫不多，其实“辨”的层次更为丰富。对作品得失的论述，力求以“由此及彼”的做法，去“辨”透一个或多重相关的现实文艺问题。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使文艺批评与“高级广告”区别开来，更主要的是使批评对作者和读者有益处，有助于创作与理论、批评与理论的互长与结合。这也是对文艺批评多样化所作的一点尝试。

第三部分的文章是老作家作品读后记或老作家访问记。这些老作家都是我尊敬的师辈。选入集子的几篇文章发表时也较有影响。有的牵涉重大事件，如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被“四人帮”一伙作为重要“罪证”，宣判《羊城晚报》和陶铸同志“死刑”并对老作家施行迫害；秦兆阳是江青宣判为“黑八论”之一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的提出者，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状况是人们关心的；关于肖殷、秦牧、黄秋耘作品的文章，是鉴于这些作品影响较大，涉及的文艺创作问题也给读者以启迪。这些文字，同样是从文艺史实和文艺理论上做“辨”的工作。《我走过的文学道路》是谈自己“辨”的文艺观的形成过程，对于关

心本书写作的读者，兴许会有些少好处，也有为使读者更切中地教正于我而提供根据之意，所以一并收录。

总之，本书的篇什记录了我力求为促进现实文艺发展而作的“辨”的工作。作家程贤章、评论家黄树森和我的患难之交刘祝庆、邓良、黄永东同志，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家声同志，还有我的妻子和儿女，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作出了大力的实际支持；中山大学出版社不嫌本书学术味欠浓，特予出版；这一切想来都是出于鼓励文艺理论批评为现实的文艺创作实践和发展作出努力之意，对此我衷心感激并力求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

作者

1987年11月10日于广州流花湖畔

目 录

说“辨”及言文艺批评观(自序).....	1
----------------------	---

(一)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	1
生活形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1
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15
矛盾冲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28
形象创造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38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46
角度·广度·深度.....	48
——评赵启强的《在百分之九十里》	
人物多样化与手法多样化.....	54
——评贾平凹的《头发》	
是赞歌不是悲歌.....	60
——评湛容的《人到中年》	
在平凡中见出非凡.....	64
——谈陆文婷的形象塑造	
陈奂生与阿Q.....	68
——评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	
可喜的第一步.....	72
——读孔捷生的短篇小说	
艺术的节制.....	80
——评孔捷生的“第二步”，兼论“意识流”	
但愿人长久.....	92
——与陈国凯谈“人之常情”的表现问题	

体现新“水位”的新作·····	100
——评陈国凯的《两情若是久长时》	
把握改革中矛盾的特质·····	103
——再评陈国凯的《两情若是久长时》	
妙在显示新的特质·····	108
——评尚予见的《车队越过鹰崖》	
宛若行云流水的乐章·····	113
——评何卓琼的《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	
爱情·人情·诗情·····	116
——读谭日超的《爱的复苏》	
抢占艺术的空间·····	121
——读林经嘉的《急流》一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	124
——评程贤章、王杏元的《胭脂河》及言若干文艺问题	
特区文学怎样写出“特”味? ·····	137
——读丹圣的《小姐同志》有感	
对生活的独特发现·····	141
——读杨干华的《天堂众生录》	
要敢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143
——与廖红球谈《爱的古藤》, 并代简致广东青年作家	

(二)

打破塑造反面人物的清规戒律·····	149
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154
——谈小说《樟田河》的评价问题	
关于悲剧的悲剧·····	165
创作方法的研究大有可为·····	174
新闻与文学交叉点的新探索·····	178
——谈《风流人物报》和它的报告文学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出现·····	184
——评外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	

一、这是一个新领域	184
二、动向分析：若干相似之点	188
三、文化观念上的认同和见异	192
四、文化和文学上的相撞与交融	200
五、值得借鉴的研究和评论方法	208

(三)

“山将永存，田将永在”	215
——重读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	
青山着意化为桥	219
——肖殷谈《桃子又熟了……》的写作	
意境的创造	225
——读黄秋耘的《雾失楼台》漫笔	
探求奥妙的境界	228
——读秦牧的《语林采英》	
更能消几番风雨	234
——访作家秦兆阳	
我走过的文学道路	239
——为《批评家》杂志“评论家列传”专栏而作	

新时期以来中国 小说艺术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当代中国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成绩和进展，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具有空前的景象和意义。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周扬，最近在一次文学作品颁奖大会上指出：“从文艺史上看，文学创作的每一个新的突破就是一个里程碑，可以作为划分文学艺术史上每一时代的标志。我们不要轻易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划时代的作品，但是可以说这次得奖的作品和许多没有得奖的作品，有一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这个评价是切合五年来我国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实际的，也是切合五年来小说艺术的实际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小说艺术的发展表现出来的。因为五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由短篇小说的突破开始，又由中篇小说的崛起而向纵深推进的，具有带动和代表性的意义。所以，我想着重谈谈个人对近五年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状况的一些肤浅看法。

近五年中国小说艺术的新突破和新水平，我认为主要表现在：

生活形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生活形象”这个词，也许有朋友认为是我的杜撰。其实非

也。亚里斯多德早说过：艺术是对生活的“摹仿”。别林斯基说：“艺术是对于真实的直接观照，或者是形象的思维。”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是生活的“再现”。意识流大师福克纳也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了一百年以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这些论述，无不指明艺术形象都是生活的形象。每一个成功的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有机的，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语）的生活形象。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首先所创造的生活形象必须是新颖的。近年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也首先表现在生活形象有了新的创造。

一、先后迭进地出现过去没有和难以创造的形象

粉碎“四人帮”不久，主要是1977至1979年，从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等作品破土而出以后，有一大批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兴起。这些作品主要是揭露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灾难和反映人民对这班野心家所进行的斗争的，所呈现的是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形象。这些形象，是过去的中国小说从未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生活，没有这样的存在；这些生活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才有的，但这个时期又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形象来。这些生活存在，只能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能被反映；这些生活形象，也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能创造出来。所以，这些生活形象的出现，对过去的小说来说，是一种发展和突破，这种发展和突破，既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又是社会条件和人们认识发展变化的结果。

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发展，要求彻底消除十年浩劫的灾难和造成灾难的根源，要求克服这场灾难造成的前进阻

力和解决阻碍前进的种种问题。于是从1979年以后，又有两种生活形象在小说艺术中兴起。一种是从当今的某些生活矛盾问题着眼，进而思考和反映这些矛盾问题的历史渊源的。如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以老寿这个农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几个故事，创造了对过去时期的生活重新思考的形象；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鲁彦周)，以罗群这个革命干部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今天才得以改正平反的故事，创造了对过去时期的生活重新思考的形象。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以一个农民在几十年时间里为造屋遭受的种种波折，创造了发人深省的形象。这种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有人称之为“反思文学”。这种作品的生活形象是在过去小说艺术中没有出现过，也是过去难以创造的。以过去的社会条件和人们的认识，还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形象来，即使在“伤痕文学”流行的初时，这种生活形象也还不可能立即出现。因此，它既是对过去小说艺术的发展，又是对“伤痕文学”的生活形象的突破。

另一种与“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是，着重反映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当今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和对这些阻力进行种种斗争的生活情景。有人称这种作品为“改革文学”。自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问世后，这一类作品越来越多，近一两年，已经取代了“伤痕文学”在小说艺术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作品自1980年后有三个发展趋向：一是象短篇小说《三千万》(柯云路)、中篇小说《祸起萧墙》(水运宪)那样，着重反映改革进程中遇到官僚主义与某种习惯势力或工作制度上的毛病而造成的种种阻力，以及人们向这些阻力不懈斗争的精神与行为；其二是象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谌容)那样，以着重表彰为“四化”辛勤劳动的中坚力量，但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心的生活，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和人生态度问题的作品；其三是象

短篇小说《丹凤眼》(陈建功)、《勿忘草》(周克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等作品那样,着重反映在社会和思想中新出现的矛盾冲突。这三种趋向的小说,在广度及深度上日益发展。这种“改革文学”所创造的生活形象,同样是社会生活和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产物,既是对过去小说艺术的发展和突破,也是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发展和突破。

自从王蒙的《春之声》、《蝴蝶》等小说出来,又有被称之为“意识流文学”的兴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创作这种文学的作家还不多,但在短短的一两年,使用这种方法的创作,从短篇一下发展到中篇、长篇(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这种文学的出现,不仅是创作手法与过去有别,更主要的是所创造的生活形象有别,因为它所创造的是人们灵魂世界的形象,是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再现,称之为“意识文学”也许较为确切,这种生活形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搬外国的产物,而主要是社会生活和人们认识发展的要求促使艺术表现的结果。因为曲折的道路,复杂的生活,使作家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思索有了更深的发展,要求创造的生活形象更符合社会生活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不仅反映外在的生活形象,还要将内在的心灵形态创造出来。这种生活形象,自然同样是对过去小说艺术的突破,也是对同时期的其他小说的突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作品所创造的生活形象,也是过去没有和不可能创造的。一种是过去往往回避描写的写国内人民与海外侨胞、台湾和港澳同胞的今天与历史关系的小说,如《空巢》(冰心)、《灵与肉》(张贤亮)、《成功者的悲哀》(欧阳山)、《彩云归》(李栋)、《深圳河畔》(陈残云)等等;另一种是过去罕见的科学幻想小说,如《珊瑚岛上的死光》(童恩正)等。这种作品创造的生活形象,同样是过去小说艺术所没有和难以创造的,也是社会生活和人们认识发展的产物。

二、越来越多而又层层深入地以过去没有的角度来创造生活形象

艺术，大都是以一定的生活横断面来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些生活横断面，既是某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该时期的社会生活。这就是说，从这个横断面中，可以管窥这个时期社会的情形。同时，作家选取和表现一定的生活横断面，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观点和体现一定的思想倾向的，只是有立场观点和思想倾向的不同，以及有比较显露和比较隐蔽的区别而已。中国小说的本质特征，是反映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发展的现实和进程，体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倾向。过去如此，现在和以后也仍然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小说所创造的生活形象都是一个模子，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小说艺术都是一个固定的格式，更不意味着创造小说艺术的形象，只有一种反映社会生活和体现思想倾向的角度或途径。如果说，过去由于历史条件和人们认识的局限，在反映生活和体现思想角度或途径方面，还显得不够多样、不够丰富的话，那么在这个方面，近五年中国小说的发展和突破是特别突出的。这个方面的发展突破，近五年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有日益深入的趋势。为了论述方便，从两方面来说。

先从反映社会生活发展这个方面来看。这五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意识文学”的发展进程和状况，不仅是小说艺术中生活形象的发展和突破，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生活，在反映角度上的发展和突破。这是因为这些反映角度，是过去未有过的，又是层层深入的。在一些人看来，所谓“伤痕文学”，只是揭露我们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未能表现生活本质、光明面；只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曲折，未能反映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种看法，有道理但是不全面。必须指出，这些

作品所写的灾难和伤痕，不是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伤痕，而是反社会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伤痕；这些灾难和伤痕，是在社会主义遭到挫折的时期才出现的，在社会主义势力战胜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后，这些灾难和伤痕就逐步克服和消除了。事实很明白：在这些灾难和伤痕折磨着中国人民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控诉和揭露的，因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正在猖獗。只有在粉碎反动势力以后，我们才能这样做。这些作品都是从胜利后的今天而去控诉灾难和揭露伤痕的。这的确是表现了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挫折。但是，这只是这些作品在形象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的情形，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形：就是这些作品无不表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思想，有的作品在形象中直接表现这信念和思想，有的则是体现在形象的后面。这个方面才是这些作品的主旨，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这些信念和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物精神和行为，正就是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社会主义发展的体现。这就是说，这些作品所写的是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社会主义发展的体现。这既是说，这些作品所写的是社会主义遭到破坏和曲折时期的灾难生活，但不是为揭露而揭露，而是旨在反映与灾难搏斗的精神和行为，旨在反映在灾难之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社会主义的前进。这样做，固然是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但从艺术发展的意义上说，不是意味着开辟了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生活的新的角度或途径吗？这就是：反映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和发展前进，除正面表现之外，还可以通过更多的侧面以至反面的角度去达到目的的。例如：一是丛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见《收获》1979年第2期）。这部小说，是写一个历来做管制劳改犯人工作的领导干部葛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监狱、被过去自己管制的犯人管制的悲剧。一是卢群的中篇小说《有这么一个地主》。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叫季万粟的老地主，解放后一直

服罪服法，老实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路线逼得要用刀杀人的故事。这两部作品，写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人物，一是专政阶级的成员，一是被专政的对象。前者的悲剧，从形象上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颠倒了。这种颠倒，深刻地表现了十年浩劫时期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反社会主义势力占了优势；同时，又表现了：即使是在这种颠倒的情况下，以葛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仍是占着实际的优势的，是继续发展着前进着的。后者的故事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使敌对阶级人物也得到改造；乔装打扮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连原来敌对阶级人物也能够分辨出来，甚至不惜豁出性命去与之搏斗，可见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深度和巨大威力。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在生活中的力量和发展，与那些正面表现社会主义力量如何占主导地位、如何所向无敌作品，是殊途同归、本质一致的。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途径和角度，有了新的扩展和突破吗？从“伤痕文学”进到“反思文学”，也同样是在反映生活的途径和角度上的扩展和突破，而且是更深意义的突破。如果说，“伤痕文学”还只是从在灾难中仍顽强地存在和发展的角度，来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和情形；那么，这种文学则是从今天对历史错误的克服和对历史教训的吸取的角度，反映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例如短篇小说《月食》（李国文）写两个新闻记者（伊汝和毕部长），在1957年的冤案中得到改正后，重回过去战斗过的老根据地的情景，概括反映了几十年革命兴旺、曲折、胜利的过程，表现了胜利的根本，体现了曲折的原因，这种以“反思”来体现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角度，也是过去没有的，是历史的突破，又是对“伤痕文学”的突破，也是对社会生活的更深的表现。

被称之为“改革文学”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同过去比较常用的正面反映的角度或途径的作品相似，其实，是有重大的突

破和发展的。例如《祸起萧墙》和《三千万》，都是写雄心勃勃的人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力图实行改革的情形，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以至失败。这些作品从形象看来，是较多揭露了种种黑暗面和存在问题，过去的文艺创作是难以这样做的，过去写社会改革的作品，通常是将揭露黑暗面放在次要地位并且大都是写胜利的结局，现在这些作品改变了过去的做法，采用了新的角度和途径，同样达到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不是反映生活角度的不断增多和深入的说明吗？

从体现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途径和角度上来说，这几种文学作品的做法都是过去没有的或较少的，这些新的做法，在这五年中又是不断发展、步步更新、层层突破的。一般人都认为近几年的文学是悲歌，只是对灾难的控诉，其实不是这样。象中篇小说《躲藏着的春天》（岑桑），虽然是控诉伤痕，但却是“灾难与希望混织的故事”；中篇小说《泥泞》（丛维熙），虽然写的是革命的泥泞道路，但却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颂歌；中篇小说《赞歌》（湛容），旨在歌颂三位县委书记的劳绩，但却是通过这三个人物的悲剧而达到了歌颂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对过去表现歌颂必须以胜利的形象体现的做法的突破。另一方面，一些作品也突破了历来表现作者的理想观点都是直接体现于对形象的褒贬之中的做法，例如：短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蒋子龙），通过这个秘书眼里之所见，写一位关心工人生活、全力搞好生产的厂长，他千方百计地拉关系为厂争到荣誉，为职工获得更多奖金，这位厂长也认为自己做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是为此而感到内疚的。作品不是象习惯的做法那样，在形象刻画上对这个人物直接表现出批评的思想倾向，而是着力表现这个人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这些事的情形，而贯穿作品内在思想和使人读后产生的效果，则是批评这样的做法